

# 诺思悖论与俄罗斯经济发展困局

聂侯诚

**【内容提要】** 俄罗斯独立以来经济表现乏善可陈。叶利钦时期各项经济社会指标直线下降，普京时期则仅有数量上的增长，没有质量上的提高。国家的作用是解释俄罗斯经济发展困局的关键。叶利钦时期，国家一方面没有提供基本的秩序，另一方面则在国内竞争约束下产出了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普京时期，国家提供了秩序，同时也形成了一套具有掠夺—分利性和非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其原因在于，政权通过多种手段克服了国内外竞争约束，国家的目的转向自然资源租金最大化。俄罗斯未来能否实现经济发展，取决于国家能否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而这则进一步取决于政权在未来所面临的国内外竞争约束。

**【关键词】** 诺思悖论 俄罗斯经济 国家发展 竞争约束

**【作者简介】** 聂侯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 一 问题的提出与已有的解释

俄罗斯自1991年独立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总体上乏善可陈。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由1991年的50.4万亿卢布下跌到1999年的32.48万亿卢布（以不变价本币单位计算）<sup>①</sup>；工业产量下降一半，居民人均货币收入购买力剧跌，四分之一的人口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sup>②</sup>。普京第一、二任期（2000～2008年），俄罗斯在油价高企的背景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2008年的国际金融

---

\* 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2020年前欧亚地区战略态势”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文章如有疏漏之处，责任由作者承担。

①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N?end=1999&locations=RU&start=1991&view=chart>

② 冯绍雷、相蓝欣：《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4页。

危机使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在政府政策调整之下，俄罗斯经济呈现一定的复苏态势。但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再次陷入衰退之中。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受到乌克兰危机和石油价格走低的外部影响作用的结果，但基本上与俄罗斯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等有着紧密联系。如果单纯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俄罗斯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治下确实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外延式的<sup>①</sup>，经济的质量和内涵并未得到提高，俄罗斯经济呈现出“有增长无发展的状态”。

俄罗斯学者对目前发展现状有更为切身的体会。2017年11月初，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名为“1991~2016年俄罗斯经济市场化转轨总结。下一步怎么办？”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俄罗斯经济25年来深陷发展困局。具体来说：第一，过去25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仅为1%，远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第二，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54%；第三，投资总额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在不断降低，比苏联后期下降10%~15%；第四，生产和出口结构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目前80%的对外贸易依然是燃料和原材料，因而卢布汇率波动很大；第五，劳动的去知识化、社会领域的退步，科学、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商业化；第六，最为严重的问题是社会两极分化程度甚至高于美国<sup>②</sup>。

对于是什么导致了经济增长，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实现经济增长，而是陷入经济发展困局这两个问题，学界从多个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自经济增长问题进入经济学家的视线以来，除制度主义之外，主要出现了两个理论解释框架。而现有的研究俄罗斯经济困境的成果也大多围绕它们展开。首先被提出的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在哈罗德和多马看来，经济增长决定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给。有的学者直接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俄罗斯经济增长乏力的现象，认为俄罗斯经济的症结在于投资不足和金融体系没有充分发挥作用<sup>③</sup>。目前学界盛行的从资源依赖型经济的角度解释俄罗斯经济困局的观点，其理论底色从

<sup>①</sup> 在此，我们对本文“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两个概念的使用略作说明。在本文中，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同义。考虑到俄罗斯经济输入型增长的特点，本文中的经济发展指的是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深化和扩大、经济结构改善、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增长以及居民福祉的增加。而在论及“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时，这里的增长特指俄罗斯建立在石油天然气收入之上的仅表现在国民生产总值数字上的增长。

<sup>②</sup> Руслан Гринберг: В стране установился семейно-клановый капитализм. <http://www.ras.ru/news/shownews.aspx?id=20dd5b1f-fe3a-456f-8024-519592234c63>

<sup>③</sup> 徐坡岭:《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载《欧亚经济》2014年第2期；陈宇:《俄罗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即资本集中于收益较高的油气行业，导致其他生产部门投资不足，油气行业一家独大，产业结构进一步畸形<sup>①</sup>。油气收入带来的经济增长建立在高油价条件下，因而不稳定和脆弱的。俄罗斯政界学界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为此推出了一些举措。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俄罗斯经济对油气的依赖不仅没有得到调整，反而愈演愈烈，而当我们回顾关于俄罗斯投资不足的解释时，又不禁要问，为什么投资不足，是什么阻碍了俄罗斯金融体系发挥作用。这些疑问说明，单纯的要素投入说并不足以解释俄罗斯经济的问题，其背后显然有更为深刻和根本性的解释逻辑。

继哈罗德—多马模型之后出现的是索洛模型。索洛认为，资本和劳动的供应不能充分解释经济增长，规模收益和技术进步的因素被哈罗德—多马模型遗漏了。技术进步因素是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常用分析框架，罗斯托、林毅夫<sup>②</sup>等都将技术因素同经济增长挂钩。国内也有学者注意到技术因素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认为先进技术供给不足，创新经济发展乏力，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sup>③</sup>。

尽管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都有重要意义，但它们仍然没有揭示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就如曼瑟·奥尔森所说：“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动机使储蓄和投资发生；或者什么可以解释创新；或者为什么一个社会的创新或资本积累比另一个社会多。他们没有从最终本源上探索增长的源泉；他们虽然探索了河湖中的溪水从何而来，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下雨。”<sup>④</sup>因此，鉴于现有文献的不足，我们有必要从新的、更为根本性的角度出发，对俄罗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做出解释。

<sup>①</sup> 陆南泉等：《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载《欧亚经济》，2014年第2期；田春生《关于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分析》，载《学海》2014年第3期；李洋：《俄罗斯的现实经济困境及深层原因探讨》，载《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程伟：《输入型增长：俄罗斯经济困局探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5期。

<sup>②</sup> [美]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页；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sup>③</sup> 戚文海：《制度变迁、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以体制变迁中的俄罗斯为例》，载《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郭晓琼：《俄罗斯经济增长动力与未来发展道路》，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4期。

<sup>④</sup> [美] 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4页。

## 二 理论框架：国家与经济发展——基于诺思悖论及其他

### （一）制度与经济发展

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注意到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复杂影响：“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sup>①</sup>。这一观点被概括为“诺思悖论”。诺思悖论指出国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双面作用：国家界定产权、提供秩序，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同时国家又可以成为“掠夺之手”和无效制度的供给者，造成人为的经济衰退。

诺思悖论的理论前提在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诺思明确指出，对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实质就是对制度创新进行研究。他认为，作为广义制度的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变量，居于经济史的中心<sup>②</sup>。张宇燕则指出，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有力的因果联系，他提出了一个较为简化的结论：唯有制度是起作用的<sup>③</sup>。

产权制度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核心。诺思认为，以产权保护为重点的产权制度的创新导致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能够增强人们开发新技术和进行投资的意愿。只有当潜在投资者认为其财产权利在当下和未来都能得到保障时，人们才会进行长期投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将诺思的理论进一步精致化，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在于汲取性的经济制度。具体而言，就是一国所有的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都是由统治者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掠夺生产者，使生产者只能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小部分，导致生产性激励不足<sup>④</sup>。曼瑟·奥尔森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能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同时还受到约束，无法剥夺或侵犯他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这样的政府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sup>⑤</sup>。高程在诺思等人的基础上，提出“非中性产权制度的分布高

① [美]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② [美] 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美]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③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④ [美]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

⑤ 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载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页。

于产权保护本身”这一命题。她认为，同普遍、平等的适用于社会各阶层的产权保护相比，带有歧视性的、非中性的产权保护同最具生产性和创造性的社会阶层或集团相结合，是一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sup>①</sup>。诺思、奥尔森、阿西莫格鲁尽管提法各异，但核心思想是明确的，即产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高程则强调，非中性产权保护同最具生产性的集团相结合，能够制造出助推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

除了产权制度以外，国家供给的作为公共产品的其他制度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瑟里和皮尔森强调了国家供给公共产品的生产性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sup>②</sup>。林毅夫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有赖于金融、法律等软件基础设施及电力、通信、交通等硬件基础设施同时作出相应改进，单个企业无法有效内部化这种成本，多个企业的自发协调也很难实现，因此必须仰赖于政府<sup>③</sup>。文一指出，经济发展有赖于一个安全有效的规模化大市场，而这样的市场是一个昂贵的公共产品，需要秉持重商主义的强有力政府同市场参与各方付出巨大的协调努力和投资才能得到建立<sup>④</sup>。

## （二）竞争约束与国家行为选择

由上可见，一个保护产权并充分供给作为公共产品的其他制度的国家，对经济发展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目的的二重性：国家既追求自身收入的最大化，同时又追求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这种“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sup>⑤</sup>。而这也是对不同国家经济绩效差异的一个绝佳注解。

那么，是什么影响了国家面对其目的二重性矛盾时做出的选择，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会倾向于最大化社会产出，制度学派的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阿西莫格鲁指出，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若想长期持续，只能是在包容性政治制度的环境当中。所谓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指人民拥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当

① 高程：《非中性产权制度与大国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② Besley Timothy, Torsten Persson. *Pillars of Prosperity: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75.

③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④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⑤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



权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非统治者<sup>①</sup>。奥尔森则提出了著名的相容利益理论。他认为，当统治者的收益和损失同社会产出的增长或减少高度捆绑时，他们在社会中就有了相容利益，这将迫使他们关注全社会的增长，向强化市场型政府转变。在奥尔森看来，民主或者竞争性政体是相容利益的产生条件<sup>②</sup>。具有中国特色的“晋升锦标赛”制度，则从政府官员这一角度提供了国家选择最大化社会产出的微观解释：即经济发展目标同官员的最大化利益重合，形成对官员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的激励机制<sup>③</sup>。

我们认为，这些解释可以被统一到诺思的解释框架中，即统治者所面临的国内外竞争约束。诺思认为，竞争约束的存在对统治者的行为有重大影响。就国内而言，“替代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者的自由度就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就越大”<sup>④</sup>。换言之，统治者将提供更近似公正的服务，促进社会产出增长。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国家作为秩序和公共服务的垄断提供者，为使自身收入最大化，会将选民分为不同的集团。由于存在国内竞争，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能力通过支持替代者从而威胁现存统治者的选民，并设计有利于他们的产权结构和具体政策<sup>⑤</sup>。因此，国内竞争约束发挥作用，还要取决于统治者所面对的国内政治制度。而将统治者群体进一步分解为每一个具体官员之后，类似的逻辑依然有效：如果官员的考评晋升取决于他们同对手在促进经济发展状况方面的表现，那么他们就有充分的动机尽可能促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在国际层面上，国家间的竞争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效率提出了很高要求。为确保国家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统治者必须着眼于最大化社会产出，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这就是国际竞争约束的作用机制。

综上，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基于诺思悖论的解释国家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困境的基本理论框架。概括说来就是，国家在一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作为发展型国家，提供有利于生产性集团的产权保护和其他一系列重要公共产品时，经济能够得到发展，反之则陷入困境。但国家存在着统治者收入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二重目的的矛盾。具体的行为选择取决于统治者面临的竞争约束。国内方面，统治

① [美]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② [美] 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美] 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

③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④ [美]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7页。

⑤ 同上，第23、28页。

者将根据其竞争者力量的强弱和各社会集团影响政治竞争结果的能力，设计效率各异的产权结构和施政方针，从而对经济发展效果产生影响。而当在国际上面临着竞争压力时，统治者会倾向于最大化社会产出，使国家扮演经济发展促进者的角色。现在我们将使用这个框架，对俄罗斯独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困境进行分析和解释。

### 三 叶利钦时期：基本秩序供应不足与国内 竞争约束下产出的低效制度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经历了极为严重的经济衰退，“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sup>①</sup>。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对经济运行所需的基本秩序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则出于政治考量产出大量低效的制度安排。

#### （一）基本秩序供应不足

经济发展建立在政府提供的作为公共产品的最基本秩序上，包括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等。在基本秩序得到维护的情况下，理性的经济人才有可能产生获利的预期，进行投资、生产等活动，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而国家则正是这些秩序的垄断供应者，因此，再糟的政府也好过无政府<sup>②</sup>。不过，不同的政府供应秩序的能力却有不同。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处于典型的弱政府、低效政府的治理模式中，制度供给严重不足，使得俄罗斯体制转型步履维艰，国家也陷入衰退当中。

政治秩序方面，叶利钦时期，俄罗斯陷入了严重的政权危机中。从1991年至1999年，俄罗斯发生了数次较大的政治危机，政府多次更迭。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选情堪忧的叶利钦，不得不向寡头求助。寡头们则通过所谓“抵押拍卖”的手段，明火执仗地掠夺了大量国家财富，并在叶利钦成功连任后，在俄罗斯政坛发挥重要影响<sup>③</sup>。俄罗斯的政权为寡头所控制，国家自主性丧失殆尽，“俄罗斯事实上已成为一个高度的依附性或俘获型国家”<sup>④</sup>。由于民众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叶利钦的支持率和政治威望不断下跌。在其执政后期，议会同政府激烈斗争，政权内部各方势力也反复分化组合，叶利钦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政治斗争上，无心治国。与中央内乱不止并行的是地方势力的坐大。

①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② [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4页。

③ 李静杰总主编：《十年巨变·俄罗斯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④ 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由于政权机关的孱弱，社会也陷入混乱当中，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集中体现在治安的恶化、恶性犯罪高发和黑社会的泛滥。由于财政困难，护法机关经费短缺，基本运行费用都得不到保障。出于政治原因，强力部门在苏联解体后进行了多次改组，护法机关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治安的恶化和黑社会的泛滥是逻辑的必然。这一时期，俄罗斯犯罪率节节攀升，而作为严重恶性犯罪的凶杀案的数量，1994 年比 1993 年翻了一番，1995 年仍大大超过 1994 年。俄原司法部长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俄罗斯每天就有一位银行家或一位企业领导人被杀”<sup>①</sup>。当政府无力提供秩序，就会有其他力量来占据真空地带<sup>②</sup>。这一时期俄罗斯黑社会的迅猛发展即是明证。俄罗斯独立后近四年，俄黑帮组织就由 1991 年的 952 个迅速增长为 8 059 个<sup>③</sup>。90 年代中期，俄罗斯全国大型犯罪集团约有 150 个，总人数达 12 万人，国内 85% 的企业被黑社会收取了保护费<sup>④</sup>。叶利钦在 1996 年的国情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现今的俄罗斯已超过意大利，成为国际社会巨大的黑手党王国”<sup>⑤</sup>。这充分说明，由于国家制度供应不足，俄罗斯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社会陷入失序的状态。

经济方面，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国家，一方面不能对经济转轨进程和运行情况实行有效干预调整，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目的，叶利钦政权产出大量低效率制度，造成俄罗斯陷入一种非效率制度均衡。

经济秩序的混乱主要体现在通货膨胀、资金短缺、影子经济泛滥和经济运行的基本司法保障瘫痪四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选择了激进的经济转轨政策：休克疗法。激进的价格自由化与过度严厉的宏观紧缩政策引发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长期持续，严重影响了经济人对未来的预期，导致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同时，过于严厉的紧缩政策使得流动性资金严重短缺，三角债问题严重，企业正常经营受到影响，经济甚至出现物化倾向。这一时期，影子经济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根据俄内务部的统计资料，影子经济的 GDP 占比由 1990 ~ 1991 年的 10% ~ 11% 跃升至 1996 年的 46%<sup>⑥</sup>。影子经济的存在，使大量资金游走于正常的体制之外，并流向投

① 海运主编：《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治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7 ~ 368 页。

② Vladimir Gel'man, "Post-Soviet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Towards Theory - Building", *Democratization*, 2003, 10 (2): p: 92.

③ 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8 页。

④ 陆南泉、左凤荣、潘德礼、孔田平主编：《苏东剧变之后·上册》新华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5 ~ 316 页。

⑤ 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第 199 页。

⑥ 陆南泉、左凤荣、潘德礼、孔田平主编：《苏东剧变之后·中册》，新华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79 页。



机和非法经济领域，造成实际生产部门缺乏必要的投资。司法体系是产权制度得以确立和维系的重要保障，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司法体系却无法向企业家提供充分的保障。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转型国家进行的商业环境调查显示，有65.2%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俄罗斯产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有效司法体系的缺位迫使企业家转向其他执行机制，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并最终导致生产性投资的萎缩。

## （二）竞争约束下的低效率制度安排

除了国家能力孱弱导致制度供应不足，基本秩序陷入混乱，制约了俄罗斯经济发展，还有另一重逻辑可以解释这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困境。即这一时期，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政府产出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使俄罗斯形成具有掠夺性和分利性的畸形经济形态。徐坡岭研究员将其概括为“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制度”<sup>①</sup>。这种经济制度的表现是：寡头代替原先的国家，掌控国家经济，形成新的垄断，进而控制市场、价格和资源。同时，实质性的企业重组和企业经营机制的市场化并未发生<sup>②</sup>。出现上述两种情况的原因，则与经济转型时期统治者面临的竞争约束有很大关系。即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造成了这样的制度结构。企业重组和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的滞后，源自俄罗斯选择的大众私有化方案。叶利钦之所以选择这一方案，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政治目的，即一方面通过尽快私有化使经济转轨进程无法逆转，另一方面，可以以此培植一批拥护、支持改革的社会团体。这种私有化方式一方面只起到了改变企业法律登记关系的作用，导致了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结构，阻碍了企业结构的变迁，葬送了私有化的经济效率目的。同时也为企业实际控制权被寡头所掌握准备了条件。寡头的形成与坐大，也与当时执政者面临的政治形势有极大关系。1995年，为缓解财政危机，保住已有的政治果实，防止政治局势出现逆转，俄罗斯政府通过内幕交易将以诺利克斯镍业集团为代表的最有获利能力的巨型国企以低价卖给几个财团，从而获取他们的政治支持。1996年总统大选叶利钦选情不利的紧要关头，以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为首的金融巨头组成了一个七人同盟，为叶利钦助选，并最终帮助其击败久加诺夫，涉险过关。七人联盟中的三人在选举结束后进入了叶利钦的政府，实现了资本同权力的结合。在叶利钦第二任期，寡头进一步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政

<sup>①</sup> 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型轨迹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sup>②</sup> 同上，第95页。

治上也呼风唤雨，阻碍经济改革的推进。由于寡头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的控制性地位以及他们资产合法性受到的广泛质疑，他们并没有心思进行生产性投资，而是把精力放在了金融投机和权力资本交易上，并在快速获利后迅速向海外转移资产。新形成的“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制度”无力促进增长，反而诱使寡头瓜分现有的资产，凸显出这一制度掠夺性和分利性的特点。

总的来说，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发展困局，从两方面印证了“诺思悖论”。一方面，叶利钦时期国家能力的孱弱导致国家制度供应能力急剧下降，国家无力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使得产权界定、契约执行等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成为空谈。另一方面，由于面临国内竞争约束，叶利钦政权为了维护自身执政地位，使经济政策服务于政治目的而非社会产出的最大化，屡屡产出低效的制度安排。从而使这一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分利过程，经济机制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变，经济发展自然也无从谈起。

## 四 普京时期<sup>①</sup>：掠夺—分利性 和非生产性的制度安排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经济

### （一）“有增长而无发展”：表现与特征

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2000年俄罗斯GDP为9515亿美元，2013年达到普京时期的最高点16790亿美元，2016年则为16280亿美元<sup>②</sup>。可见，俄罗斯确实在普京时期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增长，经济的质量和内涵并未得到提高，增长背后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本文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有增长而无发展”。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低下；经济结构没有得到优化；工业固定资产没有得到更新。

经济增长效率低下，集中表现为俄罗斯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和技术进步因素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普京2013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也指出，俄罗斯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世界先进国家的30%~50%<sup>③</sup>。如果按照2014年的数据，每单位劳动时间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俄罗斯排在世界第

① 我们将2000年以来，包括梅德韦杰夫任总统的4年，均算作普京时期。

②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end=2016&locations=RU&start=2000&view=chart>

③ 田春生：《关于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分析》，载《学海》2014年第3期。

40位,且不断拉大同排名靠前国家的差距。自2011年以后,俄罗斯全要素生产率就一直处于缓慢下滑的状态,2015年甚至降为负值<sup>①</sup>。另一方面,根据郭晓琼博士的研究,技术进步因素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小<sup>②</sup>。统计数据也表明,这一时期俄罗斯技术创新能力出现弱化,专利申请数量、科技论文数量、科技人员数量都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sup>③</sup>。

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在普京时期没有得到优化,反而出现了逆工业化的现象,并陷入了对能源行业更深的依赖当中。俄罗斯的出口总额中,油气资源占到了七成以上。根据库德林的估算,2000年以来,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与GDP的内在关联呈现不断加大的态势。而在危机后的2009~2013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对GDP增长的相关系数由危机前的0.57增至0.93<sup>④</sup>。这表明,这一时期俄罗斯GDP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能源收入贡献的。伴随着能源及相关行业蓬勃发展的,是其他行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尽管这一时期俄罗斯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和就业人数都得到增加,但这只是经济结构的一种“伪高级化”。因为,俄罗斯服务业发展并非建立在具有积极生产率意义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础上,而是石油美元大量涌入后的消费和政府购买造成的<sup>⑤</sup>。相对的,这一时期俄罗斯制造业陷入窘境,甚至出现了逆工业化的迹象。与2000年相比,2011年俄罗斯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11%<sup>⑥</sup>。目前俄工业部门绝大部分设备依赖进口,机床制造业超过90%,重型机器制造业达60%~80%<sup>⑦</sup>。从总量上看,2009~2013年,俄罗斯机器设备及运输工具占进口总额的比重提高了5个百分点<sup>⑧</sup>。这从侧面说明,俄国内已越来越无力为本国提供工业品。俄罗斯继承自苏联的雄厚工业体系已在转型过程中逐渐瓦解<sup>⑨</sup>。

俄罗斯工业部门固定资产老化现象严重。各种设施都急需进行现代化改造。

① 李洋:《俄罗斯的现实经济困境及深层原因探讨》,载《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3期。

② 郭晓琼:《俄罗斯经济增长动力与未来发展道路》,载《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4期。

③ 详见韩爽、徐坡岭:《自然资源是俄罗斯的诅咒还是福祉?》,载《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1期。

④ 程伟:《输入型增长:俄罗斯经济困局探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5期。

⑤ 这一问题的详细分析,见韩爽、徐坡岭、刘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对俄罗斯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影响》,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5期。

⑥ 陆南泉等:《俄罗斯经济是否患有“荷兰病”》,载《欧亚经济》2014年第2期。

⑦ Cooper J.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a more Militant Russia.”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2(2): 135; 李建民:《卢布暴跌成因、影响及中俄合作机遇》,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1期。

⑧ 程伟:《输入型增长:俄罗斯经济困局探源》。

⑨ 见孙景宇、胡秋阳、苏立君:《俄罗斯的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

2013 年俄罗斯工业企业建筑平均使用年限为 25 年，其中 34% 的建筑使用年限达 30~50 年。工业设施平均使用年限为 21 年，使用 20 年以上的设施占比达到 50% 以上。但是，工业固定资产更新率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的需要，部分行业的固定资产更新率甚至低于维持再生产的警戒线之下。同时，俄罗斯固定资产设备更新速度偏慢，例证就是，1991 年，俄罗斯固定资产设备的平均使用年限为 12 年，到 2013 年则延长到了 21 年<sup>①</sup>。

## （二）掠夺—分利性和非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对普京时期经济发展困境的解释

对于这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我们仍然尝试使用“诺思悖论”这一理论框架，从国家作用层面给出解释。普京时期，俄罗斯国家能力得到恢复，经济发展所需的基本秩序的供给能力明显加强，加上高油价的因素，使得俄罗斯经济在普京第一、二任期内实现了增长。但是，这一时期俄罗斯形成了具有掠夺—分利性和非生产性两重特点的制度安排，而这种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经济的内生增长和质量改进，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等都没有得到优化。当油价下跌后，俄罗斯经济的弱点很快暴露出来。

掠夺—分利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首先，经济上出现了新的寡头垄断。普京上任之初，打掉了几个不听话的寡头势力，恢复了国家对大型战略性企业的控制，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在能源、资源等行业，旧的体制外寡头垄断被新的体制内寡头垄断所代替。这些坐拥巨大财富的集团更愿意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在资源行业赚取高额利润并向国外转移，而不是将资本投入需承担更大风险的创新领域。新的垄断的形成，对俄罗斯经济结构的转变起着极为恶劣的影响，也严重制约着俄罗斯创新经济的发展。其次，腐败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私营企业主的产权也没有得到有力的保护。从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中与腐败控制相关的指数看，2003 年以后，俄罗斯的评分尽管有所波动，但始终未能恢复到 2003 年的高点<sup>②</sup>。从透明国际的全球腐败印象指数看，尽管俄罗斯的排名有所好转，并摆脱了极为腐败国家的行列，但其排名仍在低位徘徊，同洪都拉斯、冈比亚等亚非拉贫困国家处于同一水平。透明国际 2013 年的调查显示，39% 的

<sup>①</sup> 程亦军主编：《俄罗斯经济现代化进程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9~120 页。

<sup>②</sup> 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见 <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受访者表示在过去的两年里俄罗斯的腐败状况没有改善, 37% 的受访者认为比以前更严重了, 而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的反腐败斗争是无效的<sup>①</sup>。在产权保护方面, 根据俄罗斯学者统计, 2000 ~ 2010 年间, 15.2% 的企业家 (2010 年的企业家总数) 因经营活动受到刑事调查。此外, 根据俄罗斯有关专家估算, 2007 ~ 2009 年间正在服刑的企业家人数超过 10 万人, 其中 80% 的企业家经商时间超过 10 年以上<sup>②</sup>。普京在 2015 年的国情咨文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普京指出, 2014 年有关部门以经济犯罪名义立案调查 20 万起, 其中 4.6 万起案件移交法庭审理, 另有 1.5 万起案件被法院驳回。换言之, 仅有 15% 的案件完成法庭审理并作出判决。与此同时, 被立案调查的企业家当中有 83% 因此部分或全部损失了自己的企业。按照普京的说法, 就是“他们被打压了一番, 被剥夺了一番, 然后被放了出来”<sup>③</sup>。而有西方学者注意到, 由联邦安全局侦办的经济犯罪的数量由 2012 年的 1 586 起上升至 2015 年的 2 926 起, 而截至 2016 年上半年, 这一数量就达到了 1988 起。由于对俄罗斯企业主“经济犯罪”的指控往往是官员攫取企业所有权的手段, 因此, 这一数字的上升从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俄罗斯在产权保护领域情况的进一步恶化<sup>④</sup>。政府的腐败和产权保护不力直接破坏了俄罗斯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 挫伤了其投资、经营的积极性, 对俄罗斯经济有着很强的负面影响。

制度安排的非生产性的突出表现, 就是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的非生产性目的使用。具体体现在政府的社会和国防开支。一方面, 普京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教育、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福利性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支出。2005 年, 他提出了以强化社会福利保障为核心的教育、医疗、住房、农业四大民生工程。同时, 约占总额 30% 的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 在政府参与指导下被用于工资增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全民, 提升社会福祉, 当然是一国政府的职责所在。对这个时期的俄罗斯而言, 工资退休金等社会福利的增加, 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历了叶利钦时期转型之痛的俄罗斯民众的一种补偿。但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基

① 庞大鹏主编:《普京新时期的俄罗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170 ~ 171 页。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уть: идеи, интересы, институты, иллюзии/Дмитрий Травин, Владимир Гельман, Андрей Заостровцев. -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2017. Стр. 265 - 266.

③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Ф, 2 декабря 2015 года.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864>. 转引自: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уть: идеи, интересы, институты, иллюзии/Дмитрий Травин, Владимир Гельман, Андрей Заостровцев. -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2017. стр. 266.

④ Philip Hanson, "The Russian Economy in 2016."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195, p. 22.



于外部有利的原材料市场行情的增长，本质上是“输入型增长”。一个可能的替代性政策选择是，利用充裕的资金促进俄罗斯经济加速向内生增长转变，从而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下真正坚实的基础<sup>①</sup>。另一方面，普京政权把大量资金用于补贴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缺乏效率的工业企业<sup>②</sup>。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社会开支。国防开支方面，普京时期俄罗斯国防开支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2000~2010年年均增长率为6%<sup>③</sup>。2010年以来，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俄罗斯政府通过新的国家军工计划，大批武器装备投入生产，国防开支年均增长率达到10%<sup>④</sup>。国防工业在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中占有相当比重，起着提供就业岗位、维持技术储备的重要作用。但武器装备毕竟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因此，巨额的国防开支实际意味着大量的资金被用于非生产性目的。

梅德韦杰夫“全面现代化”战略无疾而终，可以看作是俄罗斯试图改变掠夺一分利性和非生产性制度安排的一次失败尝试。2008年，梅德韦杰夫在《前进！俄罗斯》一文中明确指出，俄罗斯经济上陷于初级的原料经济状态中，政治上面临着长期的腐败，社会心态依然停留在前现代状态。梅德韦杰夫针对此开出的药方则是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心态三方面的“全面现代化”。政治上，通过新修订的《政党法》，降低了建党和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同时，恢复了地方行政长官直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提高俄罗斯政治的竞争程度。经济上，梅德韦杰夫上马了一批创新项目，同时对一部分大型国企进行私有化，希望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两方面推动经济现代化。这一时期，梅德韦杰夫还力推其现代化外交，主张俄罗斯要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建立“现代化同盟”，利用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为全面现代化服务。尽管梅德韦杰夫的构想非常美好，但出台的具体措施的力度和效果都差强人意<sup>⑤</sup>。政治上虽然做出了一些加强竞争性的措施，但各项措施也都留有后手，可以确保政权对局面的绝对控制。旧的权力结构没有变化，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经济上的诸项举措也多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一时期，俄罗斯对油气资源的依赖不降反升，矿产品出口比重和油气收入占财政

①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第151~154页。

② Susanne Oxenstierna ed., *The challenges for Russia's politicized economic system*,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5.

③ Oxenstierna Susanne, "Russia's defense spending and the economic decline",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6, 7 (1).

④ Hakvåg U., "Russian defense spending after 2010: the interplay of personal,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Post-Soviet Affairs*, 2017, 33 (6).

⑤ Vladimir Gel'man, "Cracks in the Wall",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13, 60 (2), p. 6.

的比重都有所增加<sup>①</sup>。

梅德韦杰夫的“全面现代化”战略出现这样的结局并不奇怪。这一战略意味着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而俄罗斯的上层精英则要求梅德韦杰夫扮演现存体系的维护者，将普京第二任期资源分配的游戏规则相对稳定并固定下来<sup>②</sup>。梅普间政治实力对比悬殊。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政治的四个基础：中央执行权力、政权党、强力集团和地方势力一直被普京牢牢控制住，梅德韦杰夫在核心位置上没有可以倚重和完全信任的政治资源<sup>③</sup>。因此，梅德韦杰夫的改革想法不得不让位于俄罗斯的政治现实。

## 五 普京时期的经济发展困局：来自国内外竞争约束的解释

为什么普京政权产出了掠夺一分利性和非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呢？从我们的理论框架出发，普京政权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竞争约束是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普京政权为克服国内和国际竞争约束，对内提升社会福利，对外积极运用军事实力的“比较优势”，导致大量资金的非生产性目的使用，形成非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克服了国内和国际竞争约束以后，普京政权的的目的即从最大化社会产出转向最大化统治者租金，形成了掠夺一分利性的制度安排。

### （一）国内竞争约束

作为一个具有“混合政体”<sup>④</sup>特征的国家，俄罗斯的民主体系体现出“二元”<sup>⑤</sup>和“模拟”的性质。即新俄罗斯的制度体系在形式上符合民主标准，实际上上层精英却能通过种种手段，实现对国家政治进程的掌控。但是，由于俄罗斯的民主形式，这种掌控又不得定期接受民主选举的考验。可以认为，尽管大部分时间俄罗斯政治表现为上层精英的游戏，但民众支持与否，仍然对俄罗斯政治进程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民众对现行体制合法性的认可，为上层展开博弈提供了基本条件。因此，我们在对俄罗斯统治面临的国内竞争约束进行分析时，必须从

① 庞大鹏主编：《普京新时期的俄罗斯》，第352页。

② 郑羽主编：《新普京时代》，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③ 同上，第44页。

④ 这一概念通常用来形容那些既持有民主政体的某些特征，同时又显然不是民主国家的政体，见：Fathali M. Moghaddam,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Behavior*, SAGE Publications, Inc; 1 edition, 2017, p. 366.

⑤ Richard Sakwa, “The Dual State in Russia”, *Post - Soviet Affairs*, 2010, 26 (3)

上层精英和下层民众两个角度分别展开。

### 1. 来自上层的国内竞争约束

从上层精英的角度看，普京时期俄罗斯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俄国内政治竞争的严重减弱<sup>①</sup>。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普京理顺了社会上层政治、经济精英的关系，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从上而下的垂直权力体系。

议会是俄罗斯政治斗争的重要舞台。叶利钦时期，议会内始终存在具有相当实力的反对派政党，叶利钦建设从属于自己的政权党的尝试也屡屡受挫。普京时期，俄罗斯迅速建立起以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以下简称“统俄党”）为主导的政党格局。2003年以来的四次杜马选举，统俄党均为议会第一大党。后三次统俄党占有了接近半数或半数以上席位，议会中的其他席位也大都归属于政权的“卫星党”或体制内反对党，从而实现了对议会的绝对控制<sup>②</sup>。叶利钦时期议会同总统剧烈斗争的景象不再出现。而在行政机关内部，普京逐渐扶植其“强力集团”和“圣彼得堡帮”两个精英集团，二者中尤以前者势力为盛。有统计表明，在普京前两个任期的政府官员中，强力集团占了42.3%，2007年甚至占到国家官僚系统总人数的70%<sup>③</sup>。强力集团的成员对普京有着很高的忠诚度，普京通过他们，建立起一个有力的垂直权力体系，实现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

中央恢复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普京上任之初，即通过设立联邦区、任命驻联邦区全权代表、取消地方领导人进入联邦委员会的权力、赋予总统解除地方领导人职务和解散地方议会的权力等多项措施，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在地方行政长官产生方式的问题上，经历了从地方选民普选到总统/地方议会的政党提名地方议会批准，再到恢复地方行政长官直选的转变。尽管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屡有变化，但联邦中央始终能通过各种方式，拥有对地方的超强控制力和影响力，叶利钦时期联邦主体同中央分庭抗礼的现象一去不复返。

政权同经济精英的关系也得到重建。普京打掉了控制国家经济、干政欲望强烈的寡头，并对其旗下企业进行国有化，夺回了对国家重要战略性企业和重要媒体的所有权，使政权摆脱了寡头的控制。另一方面，普京任命大批在任或离任的

<sup>①</sup> 见 Vladimir Gel'man, "Political Opposition in Russia: A Troubled Transformation", *Europe - Asia Studies* 67.2 (2015); Vladimir Gel'man, "Party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Competition to Hierarchy", *Europe - Asia Studies* 60.6 (2008) .

<sup>②</sup> Richard Sakwa, "Party and power: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mobilisa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2, 28 (3) .

<sup>③</sup> 李雅君、张昊琦主编：《当代俄罗斯精英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政府高官在这些企业担任职务。这些人大多是普京的亲信。通过他们，政权得以牢牢控制住国家的经济命脉。另外，官僚集团还同其他忠顺的寡头达成默契，二者相互支持，共享政权红利，实现了权力与资本结为一体<sup>①</sup>。

由于2011~2012年出现的不稳定局面，俄罗斯政治的控制性进一步加强。普京政权加大了对反对派的打击力度，《外国代理人法》《反极端主义法》等法律相继出台，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国内公民团体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发声渠道被限制。一部分反对派在高压之下离开了俄罗斯，独立的政治组织为求自保，也不得不暂停活动或减少对政府的批评。同时，政权也不吝对以纳瓦尔内为代表的对政权有较大威胁的反对派直接采取强力手段进行镇压。另外，普京政权进一步开动宣传机器，并加大了对媒体的控制。部分国内媒体的领导层被更换，有的被迫降低了抨击政府的调门<sup>②</sup>。

总之，这一时期，普京实现了对俄罗斯政局的高度掌控和权力的垄断，原来自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的威胁，都被其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可以说，普京政权在上层所面临的国内竞争约束，被降到了最低限度。

## 2. 来自下层的国内竞争约束

在下层的民众方面，普京则通过提升社会福利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普京高度重视民生，把大量的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投入到了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性和再分配性开支当中，俄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直至2013年从未间断<sup>③</sup>。2011年，俄工人实际工资数较2000年增长了300%，居民年均退休金增长10倍，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居民在全体居民中的占比下降了16%<sup>④</sup>。普通民众的生活确实得到了很大改善，这也是统俄党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历次选举中获得高得票率的基础。

除了改善民生外，普京还利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强国心理等获取支持，形成了双保险。这一点的突出例证即是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国内出现的“后克里米亚共识”。尽管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陷入经济危机当中，卢布汇率跳水，GDP负增

<sup>①</sup> Richard Sakwa, "Putin and the Oligarchs", *Foreign Affairs*, 2008, 13 (2); Vladimir Gel'man,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bad governance in post-Soviet Eurasia: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6, 33 (4).

<sup>②</sup> Vladimir Gel'man, "2016 in Review: Russian Domestic Politics",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195, pp: 16-18.

<sup>③</sup> 程伟：《输入型增长：俄罗斯经济困局探源》，第3页。

<sup>④</sup> 陆南泉主编：《俄罗斯经济二十年（1992~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3、422、425页。

长、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但 2016 年的杜马选举中，统俄党却获得了远超之前历次选举的优异成绩。普京的个人支持率也由 2013 年的 46% 上升至 2015 年的 87% ~ 88%<sup>①</sup>。这可被视为民众对普京政权的支持。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后克里米亚共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极大地激发了俄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大国情怀，积蓄多年的对社会不公、政治腐败等消极和不满情绪转移到国际场域。调查显示，75% 的民众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危机“源自国外”<sup>②</sup>。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普京时期石油天然气额外收入带来的社会福利提升、富有技巧的外交和宣传手段所煽动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为普京政权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资源，来自民众的国内竞争约束得到克服。与此同时，非生产性的制度安排也在这一过程中确立了起来。

## （二）国际竞争约束

国际方面，普京政权借助高油价和军事实力、娴熟的外交技巧，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国际竞争约束。一方面，2014 年以前基本处于高位的油价给俄罗斯带来了巨额财富，GDP 增长了近一倍，GDP 总量在 2008 年一度跃居世界第 8 位。依靠高油价，俄罗斯似乎已重回经济强国的行列，普京甚至提出了到 2020 年，俄罗斯 GDP 总量进入世界经济前五强的目标。另一方面，俄罗斯利用作为其“比较优势”的军事力量和娴熟的外交手段，在国际舞台上屡屡上演以小博大的戏码，在全球热点地区、热点问题上频频发声，动作不断，显示出同美国旗鼓相当的架势。作为俄罗斯长项的军事与外交，在短期乃至中期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弥补了俄罗斯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短板，维系了俄罗斯的大国地位。

尽管油价和军事、外交赋予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但其缺陷是明显的。首先，将国家的经济实力系于油价之上，本身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需求乏力、大宗商品价格走低、页岩油技术取得突破的背景下，国际油价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很难重返高位。这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近年来已经非常明显。外交和军事虽然能一时掩盖实力短板，但长远来看，综合国力竞争终究还是基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外交和军事手段本身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保障。俄罗斯军事现代化计划被迫修改及欧亚经济联盟的曲折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sup>③</sup>。

① 李莉：《乌克兰危机后的俄罗斯社会情绪》，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 庞大鹏主编：《普京新时期的俄罗斯》，第 58 页。

③ 见 Cooper Julian,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a more Militant Russia”,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2 (201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交和军事因素在应对国内外竞争约束时发挥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得俄罗斯领导人的激励机制存在扭曲的风险。相对于为促进经济发展而需采取的更为复杂、见效更慢、阻力更大的改革措施，运用军事、外交手段拉升国内支持率，参与国际竞争，明显更能在短期内看到效果，同时也不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神经，有助于维持政权内部的团结。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似乎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涉身于乌克兰和叙利亚两个战场，国防开支大幅度增加。普京政权宁肯缩减社会领域的开支，也要确保军费的增长<sup>①</sup>。经济的动员性和国家的军事化程度提高。同时，有学者注意到，普京第三任期的俄罗斯经济，发生了由发展目标主导向地缘政治目标主导的转变<sup>②</sup>。激励机制的扭曲，意味着俄罗斯可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经济发展乏力→国内支持率下跌、国际竞争力下降→政权利用外交和军事手段弥补，并向其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经济发展更加乏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普京政权对上层精英进行整合，对下层民众进行收买和煽动，已经成功摆脱了外部势力对政权的掣肘，俄罗斯国内也不再存在势均力敌的潜在替代者。这意味着，迫使统治者的目标函数偏向最大化社会产出的国内竞争约束已经得到克服。国际上，普京政权则依赖高油价和军事、外交手段，掩盖了经济实力的不足，暂时解除了其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约束。而与此同时，一个包含行政官僚和大型国企领导人的新利益集团则在普京时期逐渐浮出水面。他们手里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通过政治上设租、贪腐，经济上的垄断而大发其财<sup>③</sup>。这个利益集团实际上同国家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由于克服了国内竞争约束，国家失去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转而追求租金最大化，并由此向外产出了带有掠夺一分利性特点的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同时，在克服竞争约束的过程中，非生产性的制度安排也得到确立。在这样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和制约下，俄罗斯经济中的活力始终无法得到充分释放，经济结构中的痼疾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一时期的俄罗斯陷入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局中。

<sup>①</sup> Oxenstierna Susanne, “Russia’s defense spending and the economic decline”,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6, 7 (1), p. 66; Cooper Julian,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a more Militant Russia”,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2 (2016), pp. 131 - 132.

<sup>②</sup> Vladimir Gel’man, “Revisiting Russia’s Economic Model: The Shift from Development to Geopolitics”, *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No. 397. November 2015; Silvana Malle, “Economic sovereignty. An agenda for Militant Russia”,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2 (2016) .

<sup>③</sup> Andrei Yakovlev, “What is Russia trying to defend?”, *Russ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2 (2016) .

## 结论与展望

叶利钦和普京两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困局，都可以通过诺思悖论所揭示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和国家目的的二重性得到解释。叶利钦时期，一方面国家能力急剧下降，已无力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秩序；另一方面，由于面临国内竞争约束，叶利钦政权的经济政策往往服务于政治目的，产出了大量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使经济陷入非效率制度均衡中，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普京时期经济发展的困局则体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经济增长陷入数量增加而质量不见上升的困境中。造成这一困局的原因是，普京上台以后，于上迅速控局，建立了从上到下的有力的垂直权力体系，挤压反对派生存空间，基本解除了竞争对手的威胁，于下则通过提升社会福利对民众进行收买和鼓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获取了民众的支持。普京政权基本不再面临有效的国内竞争约束。另一方面，高油价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对外交、军事手段的娴熟运用使得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仍能发挥相当的作用，暂时掩盖了其综合国力中经济的短板。这样，在国内外竞争约束都得到克服的情况下，普京时期形成的以政权为主体的新利益集团，毫无顾忌地追求租金最大化，并在此过程中产出带有掠夺—分利性特点的制度安排。在克服竞争约束的过程中，非生产性的制度安排也得到确立。这种无效率的制度结构严重遏制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活力。在高油价的情况下，俄罗斯经济尚能实现较高的增长。一旦油价下跌，这种增长便不复存在。

俄罗斯未来能不能摆脱困局，实现经济的内涵式发展，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国家能否发挥积极作用，供应有效制度和公共产品，扭转目前这种掠夺—分利性和非生产性的制度结构。而普京政权能否做出这种调整，则取决于其受到的国内外竞争约束的程度。如果目前的状态不发生实质性改变，未来一个时期俄罗斯经济仍将陷于困局当中，不会实现长足的发展。

(责任编辑 张红侠)